

邓小平的“北方谈话”及其历史意义

王 善 刘军花

(海南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海南 海口 570228)

【内容摘要】1978年9月,邓小平访朝归来,途中视察了东北三省以及唐山、天津等地,一路走一路“到处点火”,激烈抨击“两个凡是”,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第一次集中初步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许多重要内容,拉开了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辟改革开放新的历史阶段的序幕。

【关键词】邓小平 “北方谈话” 改革开放 邓小平理论
中图分类号:A84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0)01-0008-03

1978年9月13日,邓小平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朝鲜30周年庆典回国后,途中视察了东北三省以及唐山、天津等地,一路走一路“到处点火”,激烈抨击“两个凡是”,先后发表了六次重要讲话,内容非常丰富,仅在东北地区的谈话就有10多万言,包括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用先进技术和科学方法改造企业》两篇,《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一心一意搞建设》。这些谈话第一次初步集中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许多重要内容,成为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辟改革开放新的历史阶段的先声,这就是被人们称为“邓小平理论的开篇之作”的“北方谈话”。

一、历史背景:处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关键时刻和历史转折前的重大历史关头

1976年10月,战胜“四人帮”的重大胜利为中华民族走出灾难,重新启动现代化,实现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创造了宝贵的契机。确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治权威并由这个政治权威来领导中国的政治走向,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然而,在怎样认识和看待“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当时的中央高层存在着原则分歧。是坚持“两个凡是”,还是坚持“实事求是”,成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路线,使党和国家的工作在总体上一直处于前进中的徘徊局面。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路线,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发起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体现了两条根本对立的思想路线的激烈较量 and 斗争,其实质是“两个凡是派”和“实事求是派”这两种政治力量的较量。

要实现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重新启动中国现代化,就必须在思想路线和各方面工作中都彻底突破“两个凡是”的

禁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在席卷全国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能不能真正确立“实践标准”,是关系到能不能把正确的思想优势转化为政治优势,进而将中国引向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北方谈话”正是在两种思想路线激烈交锋,两种政治势力相持不下处于胶着状态,政治局面还不明朗的关键时刻发表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刚开始,“两个凡是派”就立即采取了高压态势,控制舆论宣传,不断压制这场讨论的进行,正是邓小平旗帜鲜明的多次公开支持,才使讨论得以展开。1978年7月,邓小平对中宣部负责人讲,要求他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同年8月,邓小平同文化部负责人谈话时,再次明确表态说:“我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1](P74)}。1978年9月,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关键时刻,为了进一步推动这场讨论健康发展,促成更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进一步推动中国政局变化,实现历史转折,邓小平离京,先去了四川、广东,接着访朝后又进行了“北方之行”,一路走一路发表了著名的“北方谈话”。正如邓小平在听取中共沈阳军区常委汇报时所说:“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1](P81)}包括“北方谈话”的这几把火,为实现历史转折做好了思想舆论发动和政治动员。事实上,邓小平“北方谈话”之后的一个半月内,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和军队负责人纷纷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场大讨论由此迅速扩大到全国。近两个月后,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中国渡过了重大的历史关头,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

二、主要内容:第一次集中初步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新的路线,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重大的理论创新,初步构建了邓小平理论许多支柱性内容的雏形

* 作者简介:王善(1971-),男,海南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邓小平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研究。

邓小平“北方谈话”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涉及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诸多方面,他的“到处点火”,实质上是他大胆的用新的思想去冲击旧观念的束缚。概括起来讲,邓小平的“北方谈话”第一次集中初步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新的路线,其创新性内容主要有:

1.思想路线方面,邓小平反复阐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破除现代迷信和禁锢,多次强调要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长春听取汇报时指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1]P77}他尖锐地直接批评“两个凡是”的做法说:“‘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P77}“切实加速前进的步伐,是最好的高举。离开这些,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高举。”^{[2]P128}第二天,他在沈阳听取汇报工作时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我们要根据现在的国际国内条件,敢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千万不要搞‘禁区’。‘禁区’的害处是使人们思想僵化,不敢根据自己的条件考虑问题。”^{[1]P180}

2.政治路线方面,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工作重心转移与改革开放的观点,初步提出了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邓小平“北方谈话”以发展和实行生产,实现“四化”为出发点,紧紧围绕实现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这一主题,第一次较集中初步系统阐述了改革开放问题,邓小平“北方谈话”的重点就是工作重心转移、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正如后来邓小平回忆说:“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3]P109}9月16日,他在长春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着眼于调整农村政策和改进企业管理,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对于企业改革,他指出:“要开动脑筋,敢于思考怎么样使生产增加,产品质量提高,成本降低,原材料消耗少,产品价格不断降低。搞好民主管理,建立企业的考核制度,等等。他从打破苏联模式的束缚出发,大力倡导改革,关于企业管理问题,他指出:“过去是苏联那一套,没有跳出那个圈子。那时候,苏联企业管理水平比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得多,后来我们学了那个东西,有了那个东西比没有好。但现在连那个落后的东西也丢掉了,一片混乱。”^{[1]P78}邓小平深刻阐述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并提出了一系列对我们新时期改革产生重大影响和作用的改革思路。他在鞍山市提出要用现代先进技术和方法改造企业,指出:“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就是按照经济规律来管理经济。”^{[2]P129-130}。他同时还提出了扩权的改革思路,认为必须要加大地方权力,特别是企业权力,这后来就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开始阶段的重要指导思想。他强调要打破平均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思路。邓小平在长春明确说:“不管大中小企业,搞得好的要奖励,不能搞平均主义,要鼓励先进”^{[1]P78}。“北方谈话”中,他把管理改革提到革命的高度来认识,在鞍山掷地有声地说:“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我们要在技术上、管理上都来个革命,发展生产,增加职工收入”^{[2]P130}。可以看出,这时

邓小平关于改革就是革命的思想认识已经十分明确了,正是在这个思想的基础上,他后来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提出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科学论断。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来论述改革思想。他在吉林时就敏锐地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2]P128}可见,邓小平早在1978年的“北方谈话”中就已经开始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来思考社会主义的改革问题,反思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问题。一直到十四年后“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凝练的概括,他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理论反思,始终是贯穿邓小平思想发展史的红线。

邓小平“北方谈话”对经济改革进行深入思考的同时,还对对外开放作了深刻阐发。围绕对外开放,他在鞍山重复了此前与金日成谈话中提出的“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的观点,指出“关起门来不行,要‘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北方谈话”中,他已经初步阐述了指导新时期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实践的成功思路,也就是围绕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稳步改革政治体制。他反思历史后指出“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在沈阳听取中共辽宁省委汇报工作时说:“鞍钢改造以后,必须是按照经济规律来管理。市政府是不是要考虑变成它服务”^{[1]P81}。可见,早在这时他就开始思考政府职能的转换问题。随后,他在鞍山谈到企业改革时指出:“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可”。所有这些充分说明,邓小平“北方谈话”已开始明确提出了工作重心转移与改革开放的观点,初步阐述了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

3.组织路线方面,邓小平“北方谈话”已明确阐述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和新历史时期干部队伍建设,涉及干部的选拔、考核,干部队伍的整顿和建设以及干部路线等方面。9月17日,他在中共沈阳军区常委汇报工作时指出,批林彪也好,批“四人帮”也好,怎么才叫搞好了,要有几条标准。第一,也是最主要的,是恢复我们军队的传统。第二,消除派性,根除派性的影响,真正统一了。第三,恢复军队在人民中的良好形象和名誉。第四,遵守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五,干部队伍要整顿好。他特别强调“提拔干部,要注意人的品质,注意思想,宁肯笨一点,朴实一点,也不要只看他能说会写。一定要注意干部路线”^{[1]P82}。在鞍山,他围绕企业改革,指出通过制度改革,实行对干部队伍的考核和责任制,从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他指出:“以后既要考虑给企业的干部权力,也要对他们进行考核,讲责任制,迫使大家想问题”^{[2]P131}。

三、历史意义:“北方谈话”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极高的理论意义,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新的开端和初步思索,拉开了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辟改革开放新的历史阶段的序幕

邓小平“北方谈话”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下转第12页)

类的本质。要正确掌握人究竟有什么样的特质,有什么样的本质,根据这个去考虑一切决策,这是最重要的。”^[8]只有科学地把握人的本质和规律,才能科学地回答做人的具体问题,形成科学的人生方法。否则,那种方法就缺乏依据,难以实行。20世纪80年代以来产生的许多人生观理论体系相去甚远,逻辑混乱,没有说服力,缺乏生命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仅仅停留在人生问题的讨论和做人方法的设计上。

从研究范式的角度看,把人生观的研究局限于“人生问题”也不正确。在中国,世界观与人生观两个概念是近代西方文化东进的产物,是在同一思维范式下形成的。按照这种范式,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首先是“观世界”,即研究世界真相,反映世界万物的本质和规律,例如揭示世界的物质性、时间性、空间性、规律性、可知性等,都属于对世界万物真相的认识,然后才是根据这种认识引出方法论;人生观首先是“观人生”,研究人生真相,反映人的本质和规律,然后引出人生方法论。如果人生观研究仅以人生问题、人生方法为主题,那就意味着人生观首先不是“观人生”,与上述思维范式相左了。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对于人生观的研究,不能用世界观和历史观的研究所代替,也不能局限于人的本质的

构成要素或历史性发展的研究,更不能停留在人生具体问题的研究上,而必须把人的本质和规律作为研究的主题,深入探寻人的社会本质的内在矛盾及其表现形态、发展规律和一般过程,即深入探寻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规律、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在人的本质发展中的具体展现形式。^[9]只有这样,才能日益认识人生真相,逐步形成马克思主义人生观真理体系。

参考文献:

- [1]冯定著.人生漫谈[M].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
- [2]黄国秋.人生哲学新论[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
- [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1.
-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5.
- [5]吴汉德.人生哲学[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 [6]韩庆祥,邹诗鹏.人学——人的问题的当代阐释[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 [7]张孝宜.人生观通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 [8]松下幸之助.创业的人生观[M].军事译文出版社.
- [9]郑庆生等.穿越人生的迷雾——人生哲理对话[M].天津教育出版社,2004.

(上接第9页)义。“北方谈话”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深入和全国性的思想大解放,加速了历史转折的实现。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共辽宁省委和沈阳军区随即进行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各级领导班子中形成解放思想的热潮,并很快扩展到全国其它地方。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会,讨论了真理标准问题和其它有关问题,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是好的。接着,全国绝大多数地方主要领导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纷纷表态,肯定和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很显然,这场讨论已经超出了学术探讨的范围,而演变成对重大政治原则问题的表态,从而大大减弱了“两个凡是派”的力量,扩大了“实事求是派”影响,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历史转折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社会思想基础。

邓小平“北方谈话”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北方谈话”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的历史高度,标志着邓小平理论开始形成雏形,为全新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邓小平自己反思粉碎“四人帮”后徘徊中前进的两年这段历史时,深有感触地说:“没有那两年的准备,三中全会明确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和理论路线是不可能的。”可以说,邓小平“北方谈话”正是他这两年的理论思考的集中论述和表达。“北方谈话”所具有的创新性和影响力,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认识开始发生质的飞跃。

“北方谈话”与后来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

向前看》和“南方谈话”都有着内在的联系和密切的逻辑关系,可以说“北方谈话”是这两次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的历史渊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所论述的主要问题在“北方谈话”中大部分都做了深刻阐发,“北方谈话”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理论基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又是“北方谈话”的规范表述和进一步丰富发展。“北方谈话”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开始明确揭示社会主义本质,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新的开端和初步思考,而1992年的“南方谈话”则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理论总结和经典概括。可以说,“北方谈话”是“南方谈话”的发端和雏形,“南方谈话”是“北方谈话”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与升华。因此,在邓小平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中,邓小平的“北方谈话”在不少方面都作出了初步回答,这次“北方谈话”虽然不可能涉及邓小平理论的所有方面,但确实涵盖了邓小平理论的大部分重要内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的“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坚实基础,也拉开了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辟改革开放新的历史阶段的序幕。

参考文献:

- [1]邓小平思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M].北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